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潘维 玛雅 主编

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 中国模式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潘维 玛雅 主编

人民
共和国六十年与
中国模式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 / 潘维, 玛雅主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2
ISBN 978-7-108-03405-2

I. 人… II. ①潘…②玛… III. 社会主义建设
模式—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3553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 数 321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序 中国模式

潘 维

一

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特别突出。在国外是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的震惊，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经验日益好奇和尊重，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蹿升，以致“中美共治世界”的论调大行其道。但在国内是党政干部政治理念的“多元化”，大众舆论和社会价值观碎片化，以至于知识界对国家前程深怀忧虑。

从海外看中国，六十年至为成功。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矛盾不可回避，但成就也的确不是“粉饰”出来的。中华社会高速进步，六十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这是事实。

西方的“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10%，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比起西方的进步，中国的进步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民族六十年两代人的辛勤努力创造了强大和富裕的神话，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时下流行的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

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凭什么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为什么我国

今日似乎却又深陷矛盾之中？在笔者看来，答案在于坚持或者偏离“中国模式”。

为促进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也希望促进“中国学派”在国际学界的兴起，2008年12月20—21日，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在北大中关村举办了“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来自海内外四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五十多位专家，以及数十个新闻机构的记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学者们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讨论了中国六十年来发展道路。这本《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是根据会议的现场录音编辑而成，记录了活跃的学术思想，还有身临其境的生动和通俗。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致力于为学者提供观察与交流的平台。中心每年就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主办一届大型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有关专家和海外华裔学人共襄盛举。第一届年会于2006年2月18—19日在北京皇苑大酒店举行，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主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会议论文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二届年会于2007年8月25—26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主题是“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会议实录《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和会议论文集《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三十年》已分别由三联书店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是第三届年会，这本书是这次会议的现场实录。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同步出版。本中心于2009年8月29—30日举办了第四届年会，主题为“中国对外关系六十年”。

二

民心向背是当代所有政府生存的根本。然而，人民的利益和意愿

各不相同，政策法规却只可能是统一的，政府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因此，争取民心的政治主要围绕平衡利益进行。

所有的政府体制都需要经受平衡社会利益的严酷考验，即平衡局部和整体的利益、眼前和长远的利益，以及发展与秩序的利益。而今，判断这种平衡是否出色只有一个标准：能否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本国人民的整体福祉。

“民意”来自对当前局部利益的直接认知。“民心”就不止包括民意，还包括对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间接判断。损伤了眼前和局部的利益导致一部分人民反对政府；损伤了长远和整体利益导致绝大多数人民反对政府体制。

当代日本是个有趣的例子。日本政府领导国家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比如将人均寿命提升到 83 岁，在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造就了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人均寿命说明人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然而，在日本的民意调查中，政府的支持率经常在 20% 以下，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民意支持率最低的一类。日本政府首脑频繁更换，但能进入内阁的日本顶层政治家集团非常稳定，由一个彼此有近亲关系的小圈子组成。无论经历怎样的选举，绝大多数顶级政治家就出自这个小圈子。日本的极端例子说明，民意调查中的“民意”与民心向背中的“民心”不是一回事。因为“得民心”，日本的政府体制非常稳定。

各国人民的具体情况不同，平衡利益的方式就不同，即政府体制不同。世界上有众多的政府体制，如伊斯兰民主制、美国民主制、西欧民主制、中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拉美民主制，等等。这些体制都是适应本地具体情况和外部挑战的历史产物，也都在不断地调适，在全球的淘汰赛中求生存。

现实的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体制，每个现实的体制都有优势和缺陷。

如果再抽象些，我们可以把利益平衡的手段分成四类。各种政府体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综合应用这四类手段。

(1) 强力维护社会秩序 (law enforcement)。这是最普遍，最基本的手段，却也是最浅薄的手段。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2) 回应一时一地的民意 (accountability)。这也是普遍不可缺少的手段，但也不可靠。民意如流水，正如房客随时可能变成房东。

(3) 承担对人民整体和长远福祉的责任 (responsibility)。这是高难度的手段，却是得民心的根本途径。

(4) 塑造人民的共同利益观 (consensus building)。这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政治，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因为“利益”是“建构”的，主观的。

“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回顾六十年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走出的发展道路不仅独特，而且成功。成功之处在于引领中华民族步入快速复兴的轨道，扭转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国际地位迅速下滑的趋势，把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而且，中华取得如此的成就没有依赖侵略战争，也不依赖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控制其他国家的人民。

三

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总结中国模式，前提是认同共和国的六十年取得了成功。

中国模式从哪里来？中国模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中华的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有学人说，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六十年是大变迁的六十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需要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言之，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

世上各种“模式”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永恒的成功。中国模式或许也会因为中国未来的失败而被淡忘。然而，总结今天的成功有助于认识昨天的失败，规避明天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成功被概括为拥有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法宝”。背离这个“模式”，中国革命就遭遇失败。中国革命如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亦如此。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六十年，却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的知识？只有缺乏自尊自信才会如此断言。

还有学人说，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功。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还“合法”的种族隔离，更有迄今延续不断的侵略战争。

更有些学人会说，既然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学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后发

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这个基础，中国不曾拥有，也永远不应该拥有。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几代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靠实事求是。近年来，因为迷信西学教条，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们的国家导入陷阱。

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归纳中国模式将促进“中国学派”的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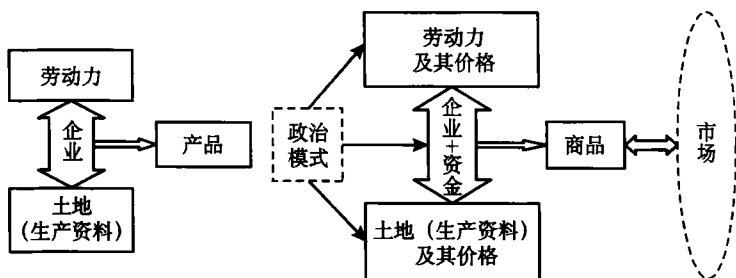
抛砖引玉。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大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中国独特的社会模式。国民经济、民本政治、社稷体制“三位一体”，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四

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也是中国模式的表层。

一切经济模式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劳动力、土地（生产资料）、企业、资本。

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用“四大支柱”来解释：1.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集体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这四大支柱是由“国”



与“民”两大部门构成的，故称“国民经济”。

1.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有如下功能：

- (1)（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
- (2) 维持了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
- (3) 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
- (4) 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2.国家拥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有如下功能：（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还使国家拥有了实施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杠杆。（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具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还因此获得与西方巨大的寡头企业竞争全球资源的能力。（3）组织建设了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营利部门，使之迅速发展和繁荣。

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劳动力市场有如下功能：

- (1) 保障广大劳动者获得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
- (2) 保障劳力的低成本暨国际竞争力。

4.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竞争的效率。（2）保障社会平等，维持了“富不过三

代”的非阶级社会传统。(3) 保障供应的弹性，以适应市场风云变幻的需求。

如此，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部门，另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三左右的庞大民营部门。“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两大部门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协调发展，是为“国民”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官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官民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使小农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

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对此世上少有异议。中国的经济规模有望很快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还可能在二十五年后超越美国，若不出现大的波折，还将在本世纪中期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一倍。

可一旦开始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中国学界就发生激烈争议：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拨乱反正”的成就，还是“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就？直到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私有化”加“市场化”都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然而，对主流的质疑也一直简洁有力：世界上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多矣，继承

了苏联的俄罗斯亦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2008 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的迷信。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六十年的成就。

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创建于前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去掉 1949—1953 年“恢复时期”的超高增长率，仅从 1953 年“一五”计划开始计算，到 1978 年我国获得了 6.5% 的 GDP 年均增长率。这个出色的增长率构成了后三十年 9.8% 年均增长率的基础。我国的工业化政策是连贯的。经过六十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因此，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是偏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偏见。确立了这个认识，才可能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才能诊治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带给我们的病症。

中国经济模式上承两千多年的自由小农经济，下继共和国前三十年开创的国有和集体经济，并汲取了当代西方左、右翼的理论和经验，是在六十年的痛苦实践中磨砺出来的。

这个官民合作的经济模式当然有缺陷，也说不上比其他模式“高明”，因为各国的政治社会历史前提是不一样的。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面前，在城乡差距，在从南到北、从沿海到高原的巨大地域差异下运作，都会漏洞百出，弊端丛生。

我想说明的是，任何经济模式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是长期“试错”的结果。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胜利的模式。中华一贯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另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可谁又能否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进口”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如此的苍白和尴尬。中国的成功应当催生自信的“中国派”。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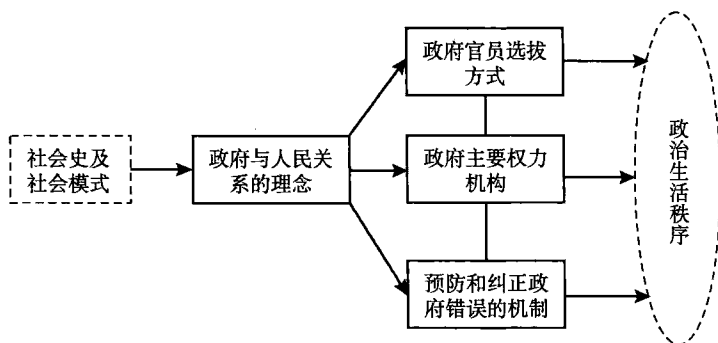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

中国工业经济脱胎于自由的家庭小农经济，中小型家庭企业占中国注册企业99%以上，与西方和东北亚的大型垄断企业形成鲜明对比。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中国传统家庭小农社会天然不利于工业化，由村民自组织起来改善村庄的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会十分艰难。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的落后非常容易，解释其成功就不能不溯及官民合作。“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工业的起点，就是官民合作的产物。

政府不受人民信任，官民合作就难有效果。对于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因为政府质量问题，官民冲突不已，工业化踟蹰不前。拉美拥有天然良好的工业化条件，但工业化进程却一直在挫折中徘徊。工业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工业的成功意味着竞争效率，效率意味着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地球上没有哪个单一的国家拥有足够大的市场来容纳任何一种发达的工业生产，哪怕是生产牙签。有效率的工业要求昂贵的交通、通讯、运输等基础设施；要求受过良好教育，懂得遵守生产纪律，做事认真的劳动者；更要求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及支持工业发展的连贯政策；还要求政府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这些，中国都做到了。

中国官民合作的经济成功显然不可能脱离政治解释。在笔者看来，“民本政治”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民本政治垮了，国民经济就崩溃。

所有政治体制都包含四个基本要素：政府与人民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政府组成人员的选拔方式；行使政府权力的主要机构；预防和纠正政府错误的机制。



“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传承了有三千余年传统的中国民本主义理念。民本主义的含义简单明了：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承担照看全体国民福祉的“责任”，否则“造反有理”，政府理应被推翻。《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何谓“德”？“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道德经》）。何为天？《尚书·周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中华的“天命观”认为，不为民服务的政府，就不得民心，就理当被人民（天）所抛弃，人民造反就有理。《尚书·多方》记载的中国第一次“革命”就是成汤代夏桀的“民主”革命。大约三千七百年前的夏代末期，当政者淫昏贪财残忍，戕害百姓，故“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显休”，光明美好）与成汤，刑殄（“刑殄”，诛灭）有夏……代夏作民主”。而（周）文王修德获天命，（殷）纣王丧德失天下，小邦周能灭大邦殷。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中国的民本史观。民本主

义成就了中国有朝代更替，无政体更替，寿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独特政治体制。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观念引入，市场力量的勃兴，中国民本主义增加了关于人民权力的思想。抛弃“皇家”，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称为“民主”。在民国，民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自民国而人民共和国，民本主义称“为人民服务”。当代民本主义要求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种民本的权力观、情感观和利益观底蕴极为深厚，是中国独有的官民“责任”关系思想，是官权正当性的根本，是中国万世一系的主流意识形态，早已融化到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了。民本的民主主义要求人民代表“公正廉明”地承担起照顾“百姓”福祉的“责任”，与承认强势社会集团“权利”的“西方民主主义”有重大不同。对中国“百姓”来说，利益集团的“党争政治”并没有必然的正当性。党争之“党”，字面“尚黑”。

2. 强调功过考评的人民代表遴选机制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绩优选拔”制度（meritocracy），即所有官员以考绩入门，依服务人民的政绩综合考核升迁。我国党政体系里的官员都需要经过“绩优选拔”的道道门槛。这是中国特色，与竞争型政党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功能而言，“绩优选拔”保证政府既敏感于民意，又承担责任，承担平衡眼前与长远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发展与秩序利益的责任。这不仅是个得民心的古老体制，就“得民心”的评估标准而言较之竞争型选举有更广阔的与时俱进的空间。当然，绩优选拔制有赖政治集团支撑，政治方向不稳定，绩优制也无从稳定。

3. 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也是中国传统。经绩优制选拔出的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皆出于“儒门”，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道义为官场纲维。“十月革命”带给中国的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先锋队”。作为共和国政治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不是西式的“议会政党”，而是具有以下六大功能的执政集团：（1）通过主

导思想斗争来保障稳定和进步的政治路线。(2)以统一的组织路线保障政治路线的贯彻,维持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维持绩优选拔制度,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的干扰。(3)统一指挥武装力量,杜绝军人干政和军事割据。(4)抵抗族裔分裂主义,保障辽阔的边疆自治地区团结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5)凝聚“统一战线”,促进各界、各族裔,以及海外华人的团结和向心力。(6)维护中华的世俗政府传统,抵制海内外宗教势力分裂社会、挟持政府的企图。比起一般欠发达国家,上述六大功能意味着发展的巨大优势,也意味着一个具有“先进、无私、团结”三大特征的核心执政集团不可或缺。

“先进”体现在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近期目标,也体现在其崇高理想,即“天下为公”,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无私”体现为执政集团秉承儒门的民本理念,“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追求公正廉明地为人民服务。“团结”体现为执政集团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并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如同传统的儒门执政集团,现代中国的执政集团也会腐朽。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强大来自严格的党纪,而纪律涣散导致党的堕落分裂,使中华民族陷入政治混战,乃至分疆裂土。因此,执政集团的“生命力”在于不断通过“党的建设”维护其“先锋队”的精英性质。党建的成败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制止党的执政官员背离民本主义,贪污腐败。党建的不二法门是走“群众路线”,防微杜渐,让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来监督执政官。

4. 中国的民本政治体制还拥有“分工制衡”的复杂防错纠错机制,与西式的“分权制衡”颇为不同。这个机制可大致归为十类:(1)民本思想对所有执掌行政权力者形成软制衡;(2)党政分工形成精致的双行政体系;(3)中央与地方形成“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相互弹性约束;(4)任期与年龄规定构成执政者定期交替的硬制衡;(5)民主

集中制渐成规范的决策制衡制度；(6) 纪检、监察、法院体系规范官员行为；(7) 定期轮换和异地任职的传统制衡制度至今仍在；(8) 人大政协信访等机构发挥着监督作用；(9) 有现代传媒技术支撑的公共舆论和种种“内参”迫使行政日渐规范和透明；(10) 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同视角导致均衡和决策谨慎。

从功能上看，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指导核心执政集团，核心执政集团维持绩优选拔和分工制衡。抛弃了民本观，后面三个支柱就会相继垮掉。

从性质上看，中国政体不是西方议会政党制，因为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的核心。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这个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理念，官员谋私，涣散分裂，就会脱离人民，导致“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就会被人民推翻，直至诞生一个新的“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

从历史角度看，四大支柱明显传承了中华的传统政治文明，民本模式的本土性和传承性远强于舶来性。六十年的历史不算长，但其渊源何止千年。中华历史没有被共产党割断，也没有因西方文明的传入而终结。如同中国象形文字在计算机时代依旧生机盎然，中华政治文明也代代相传、生机盎然。

从结果看，尽管民本模式有很多缺陷，但适应中国国情，并不“落后”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六十年来，民本政体相当出色地满足了“百姓”眼下和长远的需求、部分和整体的需求，以及既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

多数决不是维护和平衡利益的唯一方法，而且从道义、概念、逻辑上讲都谈不上“普适”。多数决有概念困境：反对票并未投给当选者，当选者为什么代投反对票的人民“做主”？多数决有道义困境：为